



武科大图书馆



A0877540

学
思
丛
书



武科大图书馆



A0877540

梁元培



教育思想论析

梁柱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 录

001	前 言	
005	第一章	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
027	第二章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与特点
047	第三章	改革封建旧教育 建立新教育秩序
061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
181	第五章	注重美感教育的美育思想
201	第六章	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子教育思想
217	第七章	以学术为导向的“第二课堂”教育思想及其践行
269	第八章	以爱国为基调的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教育思想及其践行
347	第九章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独立思想
375	第十章	倡导平民教育的社会教育思想
389	第十一章	面向社会的职业教育思想
403	第十二章	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思想
419	第十三章	大学区制的设想及其试验
431	第十四章	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443	附录：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前 言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是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朝翰林，却转变成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却又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学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确实恰当地反映了这

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对蔡元培这样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给予正确而恰当的评价，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事业，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借鉴于现在，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已开始施展他改革中国教育的抱负。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我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涉及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领域。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京大学执教，使各种人才荟萃于沙滩“红楼”；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京大学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和革新，把一个陈腐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居北京大学校长名义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今日仍为人们所怀念，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

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大学教育思想,也确实有许多创见和卓识,一些精到的见解,确是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这是仅以大学教育思想为例,而他在其他方面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是十分丰富的。

因此,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冀望通过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再现当年蔡元培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能够缕刻丝析其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获得教益;同时也借以表达对这位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蔡元培一生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精神财富。正是基于上述特点,在撰写这部关于蔡元培教育思想一书时,也将其必要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活动穿插叙述,以期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其教育思想的由来、发展和意义,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指的是对整个历史应取的态度。如果就教育方面而言,我们不也应该对从孔夫子到蔡元培来一番总结吗?诚然,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教育,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千百年教育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势必反映出某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教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应当割断历史,要承认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在建国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我们的教育体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帮了忙的,但后来的事实说明苏联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1956年,党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的任务。这次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令人惋惜的是,在这关系到我国继续前进的重要时刻,党内“左”的思潮随之出现,致使从探索新路这一正确的命题出发,却导向了错误的结

果。二十多年来，我在教育领域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经历了从新奇到迷惘到失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使我深深体会到，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许多因素，而蔑视历史，否认历史（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的继承性，以为靠批判一切便能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教育的新制度来，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定一切，最后否定了自己，被传为笑谈的所谓“和十七年对着干”便是一个否定自己的典型的口号。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经历和体会，也使我对蔡元培的教育革新活动及其教育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吧。

总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研究和借鉴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研究前人，是为了超过前人。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承北京大学杨承运教授做了大量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新世纪教学研究所林金安编审、研究生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策划编辑李海风、责任编辑岳永华为成书付出了辛劳，在拙著付梓之际，谨表由衷的谢意。蔡元培教育思想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限于著者水平，难免会有舛误和疏漏，恳切欢迎读者和同道惠予指正。

作者

2006年7月于蓝旗营

第一章

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终追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立场,为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重视教育,为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业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丽、人文荟萃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他原字鹤卿,后自己改字仲申,别号鹤卿。至创办爱国学社时,则常以民友为号。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后,尝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因取《诗经·大雅》“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个字,易号子民,从此子民成为他的通用字号。

蔡元培生长在一个中产商人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二。其父蔡宝煜(又名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和善宽厚,乐于周济他人。蔡元培从小尊敬长辈,事亲至孝。在他11岁那年,父

亲病逝，家道中落，靠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后来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债事。”从小受母亲的这种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家庭里，这对于形成蔡元培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因家贫节省灯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读。他先是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后在本县老秀才王子庄处受业，故而没有承继祖业经商，而是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少年读经，学作八股文。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学，言动拘谨。他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训，例如母亲生病，曾割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行“寝苫枕块”的古制，这在当时习俗中也算是近于迂腐了。1883年，蔡元培考中了秀才。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利禄。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绍兴的生活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开始自由阅读。那时他为绍兴一位藏书家校订图书，得到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吸取民主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1]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时，不仅对俞正燮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

[1]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举人。学问渊博，晚年主讲江宁惜阴书院。曾撰修《黟县志》、《两湖通志》等。

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曾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学说，鼓吹民权和女权。由此可见俞正燮的著作对他影响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尊重女权的思想，说明当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这时他喜爱的有关考据和辞章等的书籍，除上述俞著外，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宋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1]他偶尔也在书院里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说明蔡元培这时已开始看到八股文体对思想束缚的害处，不愿附庸清雅，把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骄子。他应试时仍是做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9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取翰林院编修。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科举道路上的幸运者，受到了时人的赞赏。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见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2]

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

[1]《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读书生活》第2卷第6期，1936年7月4日。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处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北京，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论著，披览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闾茸（卑贱的意思），外内狼狈，虚疑恫喝，以成炆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1897年，他谴责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误国的对外政策，指出：“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蔡元培对这场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现出“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在这期间，他曾较广泛地涉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译著，并

[1]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页。

对自然科学书籍发生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设施，从中加以比较，以寻求救国之道。从他读一些著述所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当时维新潮流的态度。例如，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1]后对宋育仁（清廷驻英参赞）介绍英国国情的《采风记》、《时务论》等书又评论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2]这无异于赞同维新派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蔡元培为了能直接博览外文书籍，还在京请人教授日语，不久就练习试译《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师于平壤》等文，竟“有文从字顺之乐”^[3]。其后又译过日文的《日清战史》、《生理学》等书，并开始学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他学习西方“新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烈程度，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启超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

[1]《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2]《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3]《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1]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唯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此，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羨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后来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2]和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王烈等，都曾是这样子。蔡元培到校后，为了开拓新学的领域，增聘教员，加强文理科和外语的课程，注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使这个学堂“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提倡物竞生存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旧派教员则仍要学生学习诗词和古文，宣扬尊君卑民思想。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蔡元培总是倾向革新方面。这招致了校内和地方上顽固势力的忌恨。次年，学堂学董出面干涉，竟要蔡元培亲自恭书清廷所颁“正人心”

[1]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录：《传略》，《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上），新潮社。

[2]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又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919年聘为北大教育教授兼总务长，蔡元培离校时由他代理校长。1928年曾任教育部部长。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194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著有《中国教育原理》、《西潮》等。

的上谕悬挂在礼堂上。这是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警告同情变法，昌言维新的人而颁发的，它令学人“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1]。对旧势力采取的这种警告方式，蔡元培大为愤怒，复书痛诋，随即辞职而去。

此后，蔡元培继续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为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到校视职后，曾数次演讲，倡导科学，鼓励学生研究应用科学，后因经费困难，校务改进无望，仅任职一年。随后又历经数校，并在绍兴为侨农创办了一所小学，极力推行新式教育。在这期间，蔡元培的反封建意识也有了增长。1901年，他丧妻后为续娶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后在杭州与符合上述条件的黄仲玉举行婚礼时，又以绣有“孔子”两字的大红幛代替当地风行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以来宾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闹洞房。这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举动，曾使许多人骇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规定学生半天自己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了体操课。他亲自编订学生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以及由浅入深的阅读次序。每个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都要写札记，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题多侧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权思想。课外他还指导学生练习演说、辩论。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名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发表感想。这种把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结合起来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主动钻研的兴趣，又收师生间相互切磋之益，效

[1]《戊戌变法》第2卷，第107页。

果很好。黄炎培后来回忆这一时期受教情景时曾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师之教人，其主旨在于“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1]他常常告诫学生：“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2]这反映了蔡元培有着明确的办学目的，而这感人的爱国思想，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外语，并组织演说会，定期练习演说。

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动已表现了他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学特班确也培养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澄、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他所赏识的，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这一时期，蔡元培的思想趋向激烈，开始突破改良主义思想的樊篱，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与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蒋智由（观云）、林獬（少泉，后改名白水）、叶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发起建立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中国

[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2]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教育会在宣传反清革命、联络东南地区革命同志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这些退学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学社总理。他为筹措学社经费，不顾爱子重病亲赴南京借款；登轮之际，家人赶至报告长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后事，挥泪北上。这种“临难不乱，承诺不苟变”的精神，使友人无限钦佩。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认为“学社果能达此希望”，则“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这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在学社成立之前，蔡元培还与友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女校，开始由蒋智由任经理，不久蔡元培继任，学生为发起人眷属，后逐渐增加外来学生。他在爱国学社注重培育学生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定期带领学生举行革命演说。他这时已“公言革命无所忌”。他和章太炎^[1]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革命，并针对沙俄在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号召拒俄救国。他还发起组织保国会，联络同志，扩大影响，并在《苏报》发表《释“仇满”》等重要文章，正确地指明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反对当时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

[1]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民主革命思想家。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投身民主革命。1903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4年在狱中经蔡元培联系，参加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后因参加讨袁被禁锢。1924年后思想消沉，以讲学为业。晚年赞助抗日救亡运动。在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多有建树。

排满之说。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学生一起进行军事操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曾引起清廷的注意,当时上海商务大臣吕海寰曾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1]清政府则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学社内部纠纷,愤而辞去职务,赴青岛学习德语,准备到德国留学。不久即发生了章太炎、邹容被捕,《苏报》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无畏精神于9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经常到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同年底,他与王小徐、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并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它继承了《苏报》传统,采用白话和插图形式,广泛宣传反对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为办好这份报纸付出了极大心血,除了编辑和琐碎的社务工作外,“每晚总须撰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我记得先生右手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地坐在那里工作。”^[2]

其时,蔡元培认为,革命主要是通过暴动和暗杀两个途径,因而热心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3],鼓吹暗杀主义。1904年,经何

[1] 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372页。

[2] 马鉴:《纪念蔡子民先生》,《东方杂志》第38卷,第8号。

[3] 虚无党原指俄国一些革命派的总称,主要是民粹派。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满沙皇的统治,认定农民是推翻旧制度的主力,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因其自称为人民的精粹,故称民粹派。蔡元培特别赞赏民粹派的暗杀活动,故在爱国女学中专门介绍民粹派的课程,要求学生效法俄国民粹派的暗杀手段,从事反清斗争。